

翻
译
研
究
论
丛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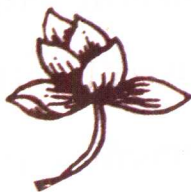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SERIES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on early moder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fiction

翻译与创作

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

王宏志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翻译研究论丛(1)

翻译与创作

——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

王宏志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1999-35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与创作/王宏志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3
(翻译研究论丛)

ISBN 7-301-04024-5

I. 翻… II. 王… III. 小说-翻译-研究-中国-近代
IV. I046

书 名: 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

著作责任者: 王宏志 编

责任编辑: 刘树森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024-5/H·0440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36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版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 新华书店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9.875印张 253千字

2000年3月第1版 2000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总 序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不少进展都是源于外来知识的冲击,令社会、文化和知识系统产生巨大变化,终于使整个文化系统面貌一新。由于知识的传递主要依赖语言为工具,外来的知识明显地牵涉到外语,所以翻译一直是传播外来知识的重要渠道。我们甚至可以说,世界上各主要文化系统的发展和翻译活动脱离不了关系。

公元8世纪,伊斯兰教阿拉伯国家大量翻译古希腊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文献,同时也引进源于印度的知识,在很短的时间内,阿拉伯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8世纪到13世纪这几百年里,阿拉伯世界在数学、医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执全球科学文明的牛耳;同时,伊斯兰教在教义和理论方面,也因为受到古希腊学术的冲击,而建立起更完备的体系和规条。

公元12世纪,欧洲以西班牙、北意大利等地为中心,大量翻译阿拉伯学者的著作,并且通过阿拉伯文的译本,重新认识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思想。这些在欧洲早已成为绝学的文献,从阿拉伯文再翻译成拉丁文,直接带动中世纪欧洲文明的重大革新。假如我们说,西方现代文明的缘起,就在于这一次基于翻译和重译的文化承传,也决不是夸大之言。

以上两个例子，正好说明翻译活动可以产生多么巨大的促进文化发展的力量。但是假如我们再思考阿拉伯文明和欧洲文明在这段时间之后的发展路向，我们会发现它们虽然都以古希腊学术成果为基础，后来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为什么同样的文献以翻译的方式介绍到两个地区，到最后会演变出截然不同的后果呢？既然外来知识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最终的分别肯定是在于阿拉伯和欧洲文化环境的差异了。因此，这两个例子也告诉我们：翻译所造成的长远文化影响并不取决于原著或译作本身，而是取决于当时的文化环境会把外来知识引上什么道路。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也有过和上述阿拉伯和欧洲类似的经验，通过翻译引进外来知识，达到文化上的飞跃发展和重大革新，其中最触目的例子，莫过于历时超过10个世纪的佛经翻译运动。始于公元2世纪中叶而大盛于公元4至8世纪的佛经翻译运动，可以说对中国文化的每一个层面都造成深远影响。中国的语言、文学、民间艺术、本土信仰、宗教组织、社会风尚等方面，都因为佛学通过翻译在中国传播而有了新的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源于本土的哲学思想在佛经翻译的高潮已经过去之后，因为得到佛学思想的启示，完成了极富历史意义的自我更新——宋明理学就是这个过程的产物。

同样，明末清初欧洲耶稣会教士到中国传教，他们通过翻译引进中国的天文、地理和自然科学知识，不但在当时的先进士大夫群中造成影响，也间接对清末力求国家自强革新的知识分子起了启发作用——通过翻译而得以传播的外来知识，在朝廷禁教之后，并没有完全烟消云散。从历史和文化意义来看，清末改革派希望从“西学”入手，达到富国强兵的

目标,可以说与明末士大夫对“西学”或“天学”的探讨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翻译传统源远流长,我们可以列举更多的例子,证明翻译活动引起的主体文化(host culture)反响是深远而又持久的;但中国本土文化所提供的环境,在上述不同的翻译活跃期,到底如何有选择性地外来知识引上某些轨道,也许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这样的研究才会充分显示翻译活动作为跨文化沟通的枢纽,其可能性和局限性在于什么地方。综合上面所列举的种种情况,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要从事深入的翻译研究,应该考虑两大范畴:第一是主体文化的规范和环境,第二是翻译活动与主体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产生的相互影响。

过去中国的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很少涉及翻译活动如何在主体文化里面运作的问题。在这样的研究范畴之内,从事研究的人很难脱离“原文”观念的限制,也因此绝少触及翻译活动所能产生的庞大文化力量,以及翻译活动和主体文化之间的互动作用。但正如上文提到,翻译是否能造成文化影响,又或是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其实并不在于语言转换的过程,而完全视其主体文化如何制约,又如何接受这个过程的产物,所以如果我们把眼光局限于文本或翻译机制,而漠视主体文化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面对中国翻译传统如此丰富的材料,实在让人有入宝山而空手回的感叹。

翻译研究作为一个新学科,在70年代就已经开始文化层面的探索;但我们对中国翻译传统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

未达到真正突破性的发展。这套《翻译研究论丛》的着眼点，正是从主体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翻译传统，希望通过分析前人的经验，对翻译活动的文化意义达到更深入的了解。

孔慧怡

1998年2月于香港

目 录

总序	孔慧怡(3)
导言:教育与消闲	
——近代翻译小说略论 (代序)	王宏志(1)
从奏章到小说	
——试论近代的一种前景想象	王晓明(17)
晚清社会对西学的认知程度	熊月之(28)
略论近代的翻译小说	王继权(43)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的分期及其主要特点	
.....	郭延礼(56)
还以背景,还以公道	
——论清末民初英语侦探小说中译	孔慧怡(88)
凡尔纳、科幻小说及其他	卜立德(118)
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	
——经日本传到中国的翻译小说	樽本照雄(151)
“专欲发表区区政见”	
——梁启超和晚清政治小说的翻译及创作	王宏志(172)
试论近代翻译小说对言情小说的影响	袁进(206)
包天笑、周瘦鹃、徐卓呆的文学翻译对小说创作之促进	
.....	范伯群(225)

斯托夫人与批茶女士

——晚清翻译文学误读之一例 夏晓虹(234)

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

——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 陈平原(247)

翻译“现代性”..... 王德威(276)

后记..... 王宏志(305)

导言：教育与消闲

——近代翻译小说略论(代序)

王宏志

在较新的理论里,翻译被认为是政治性十分强烈的活动。透过翻译所引入的新思想,既能够破坏以至颠覆接受文化中现行的权力架构及意识形态,又能协助在接受文化中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及架构,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造成重大的冲击。这样的翻译观,实际上是建基于对译文本身以及接受文化的重视,一方面冲击了过去以原著为中心的翻译观,另一方面又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局面,是它能够在70年代开始逐渐演变成成为严肃学科的一个重要契机。这样的研究路向,可以把翻译研究从过去那种简单比附或对照原文译文的做法解放出来——毕竟千篇一律的对比,能够得出来的可能性很有限,所得的结论不外是译文是否忠于原著,又或是译者怎样解决原文文本所出现的翻译难题。这样的讨论大多只停留在文字上的修饰,却往往忽略了这些现象背后许多更核心的问题——诸如译文“忠实”或“不忠实”的原因在哪里?是译者故意的选择还是译者的能力不足?这些选择的动机在哪里?跟原著有关吗?跟读者有关吗?跟社会的要求(包括市场)有关吗?跟当时接受文化中的文学环境有关吗?又或是为什么能力不足的人仍然可以充当“译者”?这原因在哪里?读者对“译者”有什么期待?……

诸如此类的问题,并不是对比原文和译文的文本就能认定或解答的。

对于本书所考察的对象——近代中国翻译小说——来说,不能和不应将原文和译文对比,然后作出是否忠于原著的判断,更是明显不过。首先,今天我们看晚清翻译外国小说,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就是没法确定原著是什么,一方面是当时的译者并不着意说明原著以及原作者,另一方面是很多译本都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我们同样没法跟原著进行对比。其次,即使能够确定原著,但只要稍为翻阅一下,便可以肯定当时绝大部分的译文都是不忠实的。面对着这普遍地“不忠实”的翻译现象,态度应该怎样?把整整一代的翻译小说草率地贬斥为“胡译”、“乱译”,对于理解这时期的翻译活动,会有多大的作用?因此,如果我们的结论只停留在这些现象上的对比,显然意义不大。

在这里,我们会以两个表面看来矛盾的小说“功能”——教育与消闲——作为切入点,来讨论晚清的翻译小说。

二

清末民初是文学翻译大盛的时代。傅本照雄曾统计过,1902至1918年间,翻译小说共有4362种,数量可说很惊人。^①不过,这样大规模地引进外国文学,并不是因为文学自身的沿革,而是基于政治上的需要,它可以说是较早时候翻译和介绍一些西方实学的一种转化。

实学的介绍,比文学翻译来得早。据熊月之的报告,从1843年上海等东南通商口岸开埠开始,西学即在中国传播,至1900年,出版有关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和经济等方面的书共660种,^②但翻译小说差不多还没有起步,1897年梁启超作《论译书》,列出应译的九大类书籍中,并不包括小说,^③只是严复和夏曾佑所

作《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才有“译诸大瀛之外”小说的建议，但也不见有马上积极付诸实践。^④由此可见，首先出现的是实学翻译，然后才是文学翻译。

其实，无论是实学翻译还是文学翻译，都同样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就是因为中国连续败于列强之手，不得不向外国学习，因而有翻译外籍的需要。但中国人向来以其悠长的文化自豪，因此，在最初的阶段里，他们还只是愿意承认外国人的长处在于“船坚炮利”，值得学习的，也只不过是物质方面的东西，即所谓的“器物”。魏源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是“以夷之长技以制夷”，而所谓“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⑤他们坚持中国有优胜的地方，翻译西学，只不过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⑥，这是翻译先从实学入手的原因。即使在最初的阶段里，有人兴之所至的把一些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也只是所谓的一种“入我们门来”的翻译观。^⑦

但 1896 年甲午战败，却带来更深远的影响。梁启超说过：“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⑧虽然我们在上面说过，梁启超 1897 年所写的《论译书》中并没有包括翻译外国小说，但却已清楚指出，“中国之患，患在政治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不专在格致也”，^⑨仅仅把“器物”输入已不足够，严复在中国思想界产生极大影响的《天演论》，便是在这时候开始翻译的。^⑩接着下来“百日维新”的失败，使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原来依靠维新救国的“官方”渠道受阻，不得已转而向群众入手。当时梁启超看中的是小说对群众的影响，这是《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中心思想，也是“小说界革命”的由来。

小说界革命的出发点，在于认识到小说的社会功能。《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所强调的，是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这点不少论者已有详细的讨论。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可以说是后来“全盘西化”的理论之

滥觞,原因在于他所要提出的,实际上是要革掉传统小说的命,甚至是全体中国传统文学的命。在梁启超“常带情感”的笔锋下,小说的地位给提升至前所未有的位置,是“文学之最上乘”;^①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小说却一无可取,地位低微,著者多为市井俗夫,内容方面只知海盗海淫,更是“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相对而言,西洋小说却是文学的正宗,著者皆为硕儒通人,写的都是政治议论,与政体民志息息相关,对国家政界的进步极有裨益。^②在这情形下,译印域外小说,便是小说革命的第一步,也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了。^③这就是晚清文学翻译大盛的原因。^④过去,不少人都认为在这段时间里,翻译小说比创作小说还多,^⑤不过,樽本照雄以非常准确的统计,算出在1911年以前,创作是翻译的1.27倍,前者为1288种,后者为1016种。^⑥但无论如何,翻译小说的数量确算得上十分惊人。

熊月之、王继权及郭延礼的文章,都对清末民初的翻译潮进行了分期。熊月之的讨论以实学为主,但正如前面所说,实学翻译是中国近代翻译的先驱,跟小说翻译的动机有共通之处,理解新学的引进,对于认识小说翻译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文章分析了晚清社会对西学态度的转变——从夷学到西学,再到新学,是一个由抗拒至接受的过程,如果我们以这过程来跟小说翻译的过程对照一下,不难看出其中微妙的分歧:前者是由抗拒至接受,而后者则在很短的时间内大为流行,以致有人出来要求多创作小说。最重要的当然是时间的因素:小说翻译来得较晚,当时社会普遍已认同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所以要打倒旧小说,透过翻译来倡议新小说,并没有多大困难。但另一方面,由于小说向来不属于“文学正宗”,新小说的倡议者很容易便能说服读者它有很多问题,亟须改革,接受舶来品是很合理的选择。

三

表面看来，既然外国小说在梁启超等人心目中是这么完美，而翻译小说的数量又这么多，那么，小说革命应该会是成功的，最少可以在中国民众中产生很有建设性的影响。但事实是不是这样？

由于翻译外国小说的目的是要改良政治，顺理成章，最早给介绍到中国来的便是政治小说。政治小说一词的输入，比小说界革命还要早，⁹⁷1898年12月，《清议报》便开始连载梁启超翻译的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也早于翻译过来的言情小说及科幻小说。⁹⁸对梁启超等人来说，政治小说吸引的地方，在于作者能将“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而“各国政界之日进”，政治小说的功劳最大。⁹⁹结果，在一段时间里，政治小说的翻译和创作很是兴旺。

不过，王宏志的文章《“专欲发表区区政见”：论梁启超政治小说的翻译及创作》指出，晚清政治小说的翻译及创作最终是失败的。尽管传统以来，文学与政治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很多政治书写都成为了优秀的文学作品——《诗经》、《楚辞》以至《史记》、杜诗甚至诸葛亮的《出师表》，都是政治性很强烈的作品，但梁启超等人所翻译和创作的政治小说却很不一样：他们所要求在作品中表达的政治内容极为具体，而他们的政治目的也极为明确，与他们当时的政治日程是紧密挂钩的，这跟过去以讽谕形式来作政治书写的作品很不同，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翻译方面，政治小说的内容往往与原著国家的政治及社会事件有密切的关系，勉强翻译到中国来，确有不合国情的情况出现，特别是他们所翻译的政治小说，不少出自日本作家之手，这些日本政治小说大都完成于甲午战争前后，当时日本跟中国正处于竞争以至敌对的状态，能够促进日本“政界之日进”的政治小说，对中国却很不利。王宏志的文章中，便

以梁启超翻译柴四郎之《佳人奇遇》为例，阐释了翻译外国政治小说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便须自己进行创作，也就是说，借助外国小说的形体，写出中国的小说来。

不过，即使在创作方面，“政治小说”这种“文类”也产生很多问题。晚清政治小说作家所犯的最大毛病，在于过于急躁地、直接地要传达政治思想，忽略了小说这种文体的娱乐功能。梁启超自述所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的文体，可说是最能说出政治小说的弊病：

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稍殊。篇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饜读者之望矣。⁶⁴

这真有点知其不可以为而为之的味道，但却与最早提倡小说界革命时的大前提相违背：小说之所以能够用来推动政治改革，正在于它易于感动人心，如果它跟演说论文等毫无分别，毫无趣味，根本不可能有丝毫感人力量，也无法发挥它的社会教育功能了，今天看来，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但对于梁启超来说，这是正确的选择，原因在于当时梁启超等人所要扮演的角色，是政治的改革者，而不是文学的改革者。

在这情形下，政治小说的翻译及创作，只经历了一段很短的光辉时刻，待到社会人士的政治热忱冷淡下来后，政治小说便给遗忘了。

相对来说，其他小说体裁便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

诚然，在小说革命的热潮中，不少本来政治色彩较淡或甚至毫无政治色彩的外国小说，在介绍到中国来时，都被加以一种“政治性的阅读”——译者往往在译序或后记中引导读者去“阅读”其中的政治意义，且把中国的政治环境联系在一起，最显著的例子是林纾所翻译的《黑奴吁天录》。

《黑奴吁天录》里面的政治色彩，不像《佳人奇遇》或《新中国未来记》那类狭义的政治小说般浓烈，里面也没有连篇累牍地载入法律、章程、论文等，但其中所描写美国黑奴遭受到的虐待，能够在晚清社会引起强烈共鸣，一方面是因为那时候中国有亡国灭种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国人知悉华工在美也受到不平等对待。林纾在译跋及例言中都提到这两点：“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⁶⁰、“且证诸叱嚙华人及近日华工之受虐，将来黄种苦况，正难逆料”⁶¹，就是这个意思。在这情形下，《黑奴吁天录》在中国读者中便造成了很大的回响。灵石以强烈煽情的笔触（“涕泪九澜”、“且读且泣，且泣且读，穷三鼓不能成寐”）将中国现状跟黑人境况相比较，“以我同胞未至黑人之地位”而喜，亦以我同胞“恐终不免黑人之地位”而“为同胞危”，因此，“我读《吁天录》，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已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⁶²。于是，一本完全与中国毫无关系的美国小说，便能够在中国政治中发挥作用，甚至改编成剧本，由春柳社搬上舞台，从而希望能够超出文字的界限，对群众产生影响。

除了《黑奴吁天录》这一类能够“唤醒我国民”⁶³的小说外，其他的小说类别也同样被加上“政治性的阅读”，也就是说，原著在本土的读者眼中，不会被视作具备任何政治色彩的，但在传入中国的时候，却也被解释为肩负了政治的任务，例如科学小说被说成是开启民智的有效工具，中国人“智识荒隘”，便是因为欠缺了科学小说⁶⁴；侦探小说则可以反映出“内地讞案，动以刑求，暗无天日者，更不必论”，而“泰西各国，最尊人权，涉讼者例得请人为辩护，故苟非证据确凿，不能妄入人罪。此侦探学之作用所由广也”⁶⁵；更不要说狄更斯《贼史》一类的所谓社会小说，“能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则社会之受益宁有穷耶”等⁶⁶，都是热切地将改革社会的政治功能赋予了外国小说。从“新小说”的倡导者而言，这一方面可以增加输入新体裁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是要使原来没有政

治色彩的小说作品,同样能够为晚清政治做出贡献。

但无论如何,相较于政治小说,各种其他小说体裁里的政治成分,始终只占次要的位置,对于梁启超等一心一意要把小说用作改良社会工具的人,这些小说或有不足之处,但对于读者来说,却另有吸引的地方,那就是小说的趣味。结果,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些小说便取代了政治小说,成为大受欢迎的作品。

上文说过,政治小说很早便给翻译过来,但其实,在各种小说体裁中,侦探小说的输入,比政治小说还要早:1896年8月,《时务报》连载了福尔摩斯侦探案《英包探勘盗密约案》。虽然有人认为侦探小说跟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有相类之处,但毫无疑问,它确是中国传统中所缺乏的文类。尽管在最初的阶段,它不及政治小说来势汹汹,但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最受欢迎的外国小说。陈平原统计过,1896至1916年间,翻译数量第一的便是柯南道尔,共有32种,远超于其他作家。²⁸孔慧怡的文章《还以背景,还以公道:论清末民初英语侦探小说中译》精辟地分析了侦探小说流行的原因,她一方面指出,侦探小说在中国流行,实际上跟侦探小说在世界各地普遍受欢迎是分不开的,侦探小说在西方还是知识分子的消闲文学;另一方面,她也正确地论定:对中国读者来说,侦探小说不论在内容和形式都是新奇的:“侦探故事中经常提及新科技——火车、地铁、电报等——全是19世纪中国人羡慕的事物”,受到如饥似渴地要吸收外国知识的中国读者欢迎,是最自然不过的了;还有的是侦探小说的主角具备坚强的体能和智能,以及小说长于故事结构,也是它在中国流行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都是中国所欠缺的素质。²⁹

具体来说,孔慧怡所列举侦探小说兴盛的理由,可分成两部分,一是侦探小说跟国富家强的关系,如展示国民素质以及上面提到侦探学跟中国刑政的关系等,这是政治方面的。不过,如果侦探小说只有这方面的价值或吸引之处,它也许只能跟政治小说有相